



译者身份对翻译选择的影响

——比较哲学视域下《道德经》的英译研究

贺莎莎, 葛中俊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译者的职业身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为探讨译者身份对《道德经》翻译过程的具体影响, 结合安乐哲与郝大维的《道德经》英译本, 分析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对译者翻译观与翻译选择的影响。译者身份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具体包括译者身份对翻译选材、在中西哲学观比较中建构道家哲学语境、在道家哲学中诠释核心思想术语和用过程性语言体现过程哲学这四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 译者的职业身份既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观, 又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 译者身份; 安乐哲; 比较哲学; 《道德经》; 翻译选择;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10-0513-06

Influence of translators' identity on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aode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HE Shasha, GE Zhong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ranslator's identity influences his or her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nfluence of translator's identity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Daodejing*,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Daodejing* by 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to analyze how translators' identity as a comparative philosopher affects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view and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pecifically, the effects of translator's identity on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clude four aspects: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 construction of Taoist philosophy context in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text, translating key words in Daoist context and embodying process philosophy by procedural language. It is found that translato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not only influences translator's view of translation, but his or her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translator's identity; Roger T. Ame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Daodejing*; translation choice; translation strategy

《道德经》是一本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经典,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6世纪起,《道德经》就被传教士译进了西方世界。据调查^[1],《道德经》已有英文版82种,法文版109种,德文版

240种,由此可见《道德经》在西方世界极受追捧。《道德经》作为中国文化经典著作之一,研究《道德经》的翻译实践对于中国文化如何更好、更稳地走出去具有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2020-04-16 网络出版日期:2020-06-20

作者简介:贺莎莎(1997-),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葛中俊, E-mail:gezongjun2000@126.com

国内学者对《道德经》不同译本的翻译实践已做了系列研究。路斯琪等^[2]分析了儒莲翻译《道德经》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认为《道德经》儒莲译本的经典化与译本的审美价值、创造价值及其忠实性密切相关。夏歆东^[3]认为理雅各译解《道德经》的前理解结构影响了他将《道德经》基督化的翻译选择。吴冰等^[4]认为韦利在《道德经》译本中重构历史文化语境的路径及特点,对于阐释《道德经》有很大价值,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张小曼等^[5]认为意识形态差异和诗学差异造成译者对《道德经》原文理解、采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不尽相同。张骋^[6]认为韦利与安乐哲和郝大维两个译本对“道”诠释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未能深入了解中西语言文化结构的不同点,而后者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有深入见解,以至于后者的译本是最接近《道德经》原貌的好作品。现阶段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道德经》不同译本的文本层面,其中对翻译方法的研究居多,对译者的研究还较少,尤其缺乏对译者身份的考虑,但译者的职业身份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不容忽视。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注意译者研究,并提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屠国元等^[7]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本文以为,对译者身份的研究从属于译者主体性研究,译者身份主要通过影响译者视域来制约翻译过程,也即通过影响译者理解源文本来影响翻译过程。具体而言,译者身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以及译者理解译本的角度。例如,身为传教士的译者主动将翻译中国典籍与传播福音联系在一起,理解源文本时又难以避免在西方宗教的框架内理解中国典籍,最终中国典籍在译者笔下以基督化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此,本文结合安乐哲与郝大维的《道德经》译本,通过分析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及翻译实践,探讨译者身份对译者翻译观和翻译选择的影响,具体包括译者身份对翻译选材、在中西哲学观比较中建构道家哲学语境、在道家哲学中诠释核心思想术语和用过程性语言体现过程哲学的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一、比较哲学视域下的翻译观

从《道德经》外译的历时角度分析,《道德经》的译者身份主要包括传教士、汉学家、诗人、书法家和哲学家等。其中,译者安乐哲是美国著名比较哲学

家和汉学家,郝大维曾在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接受西方哲学训练,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刻的见解。《道德经》的英译过程与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相关,特别是与构建其身份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影响着译者还原道家哲学本原的翻译观。

在《道德经》安、郝译本的序言中,译者阐明了复译《道德经》的主要目的——维护《道德经》的本义,还原其本来面目^{[8]13-14}。安乐哲与郝大维认为,《道德经》作为蕴意深远的哲学经典,其翻译实践却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而非哲学家来完成,哲学家的不在场导致西方思想侵入其中,《道德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8]14}。还原《道德经》的本真蕴意也是两位译者作为比较哲学家在哲学视域中对翻译效果达成的共识。实现这一效果的主要路径是将《道德经》放在其本身的范畴和哲学框架中讨论。译者比较哲学家身份的背后是对异质文化的尊重,是深厚的东西哲学素养和对汉语文化的深刻了解。也正是受其比较哲学家身份的影响,译者笔下呈现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道德经》译本。

二、译者身份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安乐哲与郝大维翻译《道德经》时希望还原其本真思想,只要译本能达到还原《道德经》本真的翻译效果,对于采取何种翻译策略两位译者是互相认同的。故具体分析译者的职业身份对翻译策略选择影响时,本文主要从安乐哲出发,探究比较哲学家身份对《道德经》翻译选择的影响。

从赴香港中文大学求学开始,安乐哲就在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研究过程中,安乐哲深受刘殿爵、唐君毅、劳思光、牟宗三、葛瑞汉、葛兰言、怀特海等哲学大家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专注中国哲学典籍、通过比较哲学视角理解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理解哲学术语、将中国哲学归属过程哲学等哲学研究方法。本文结合安乐哲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具体从翻译选材、在文本中建构中国哲学语境、核心思想术语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本语言特点四个维度来探讨译者身份对《道德经》翻译实践的影响。

(一) 翻译选材

安乐哲18岁时曾作为交换生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在该校新亚学院和崇基学院学习期间,安乐哲曾师从唐君毅、牟宗三和劳思光,并跟随牟宗三钻研《孟子》^[9]。安乐哲正是在此期间开始正式接触中国古典哲学,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性情,这

种性情又随他辗转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求学的过程中稳定下来,并结构化到安乐哲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也为他成为比较哲学家打下了基础。

安乐哲作为深谙东西方哲学的比较哲学家,翻译选材自然也受其身份影响,这一点体现在他翻译过的经典译著里。在翻译《道德经》之前,安乐哲翻译的文本都是哲学典籍,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与刘殿爵合译)、《论语》(与罗思文合译)和《中庸》(与郝大维合译)。译者专注于研究哲学的行为影响着他从中国古典哲学中选择文本。当安乐哲与郝大维发现集道家哲学大成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中被曲解时,译者的哲学家身份影响甚至决定译者重新阐释《道德经》,而安乐哲与郝大维出版的《道德经》译本也正是受译者比较哲学家身份影响的外在表现。

(二)在中西哲学观比较中建构道家哲学语境

安乐哲在求学和工作过程中,受老师们比较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从比较哲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哲学典籍的稳定性情。对于从比较哲学视角来阐释中国典籍的方法,安乐哲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这是一个学术谱系,始于伟大的汉学家葛兰言,接下来是李约瑟、葛瑞汉,以及我和我的合作译者,我们都是这个谱系下的一部分。”^[10]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译者又进一步强化了比较的意识。例如,在译解《道德经》之前,安乐哲与郝大维在《孔子哲学思微》^[11]一书中就曾比较过孔子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异同、中西方人格论的差异和中西社会政治观的差异等等;在《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12]中也随处可见比较视角的影子。由此可见,译者通过比较视角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性情已经融入译者比较哲学家身份的构建中。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不仅影响了译者解读中国哲学典籍的方式,也直接影响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通过比较的视角来建构道家哲学语境的翻译选择。

在《道德经》译本的哲学导论中,安乐哲与郝大维从比较中西哲学的视域来分析道家宇宙论背后的预设,也即构建中国哲学语境。道家关联宇宙论始于这样一种预设——我们的生活经验之流常新且连绵不绝,它强调世界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动态的变化背后,道家哲学里没有一种“始基”或者“本源”来解释世界的创造过程。在中国古典哲学观中,时间与空间紧密渗透,不存在独立于空间之外的“永恒”。西方传统哲学观与道家宇宙观截然不同。从cosmos的深层语义可知,早期希腊哲学中的宇宙是“由自然和道德法则所统治的单一秩序的的神的宇

宙”。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将时间与空间分裂,造成西方传统哲学总是从固定的形式(“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基于第一个预设,道家关联宇宙论的第二个预设是事物都是过程性现象,且事物与其所处域中的其他物都内在地关联着。我们的当下经验由种种变化互渗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为新事物的自发创造条件。道家宇宙论肯定事物的新奇性与创造力,而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因为上帝是主导世界生成的全能的他者,所以事物的自发创造与新奇性也须出现,而创造力产生的结果,也只是上帝的衍生物^{[8]16-21}。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古典哲学重视事物的自发性。道家宇宙论的另一预设是“我们不是我们经验的被动参与者”。对于这一预设译者未做过多阐释,但译者提及,世界万物的转化力量不需要造物主,“也不需要任何什么都限定了的第一原理”^{[8]26-27}。而造物主与限定万物的第一原理,正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现象背后的定有“始基”的观点。

安乐哲早期的学习经历奠定了他的西方哲学基础,后期跟随各大家的学习过程又奠定了他的中国古典哲学基础。安乐哲的前辈们如葛瑞汉、牟宗三、唐君毅等一直提倡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哲学。受此影响,安乐哲将比较的方法内化成性情,性情又与其他因素一同构建了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在《道德经》英译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既影响了译者解读文本的方式,即有意识地避免通过西方传统哲学来理解文本,又影响了译者的翻译方法,即通过比较中西哲学观来建构道家哲学语境,让读者回归到道家哲学中理解《道德经》。

(三)在道家哲学中诠释核心思想术语

1975年,安乐哲开始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学贯中西的刘殿爵教授。刘殿爵对中国经典的修养极深,英语造诣也很高,他翻译的《论语》《孟子》《道德经》等在西方已是经典之作。刘殿爵曾探讨过中国古代哲学的翻译问题。在一般著作中,译者可以用他认为最贴近上下文的方法去翻译,唯一需要仔细考虑的是怎样把意思呈现出来,而在哲学著作中,译者经常要用同一字词翻译同一术语,以此让读者知道原文用的是同一术语,但这种方法并不经常奏效,且怎样翻译受制于英语的束缚^[13]。在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刘殿爵阐释关键概念时并不局限于文字对应,他更关注回到典籍原本中,从原文思想来阐释关键概念。例如,刘殿爵在《道德经》译本的导论中阐释“道”的思想时,结合《道德经》中阐述“道”的章节和老子的思想(如万物相互依存、守柔

思想等),对“道”进行了系统性探讨^[14]。在这一层次上,刘殿爵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释影响了安乐哲比较哲学家身份的塑造过程。安乐哲阅读文本的特点也正体现了这一点——阅读和理解任何一个文本,要尽可能地将文本放回到其思想背景中^{[8]87-88}。

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翻译《道德经》中承载道家思想术语的方法选择。此处以“无”形式为例。“无”形式术语共同构建出的意义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翻译过程中,两位译者并非只根据“无”形式术语的上下文或其字面含义来阐释意义,更多的是通过老子思想来解释“无”形式的哲学意义。本文以两位译者对《道德经》中“无为”与“无知”的翻译为例,并结合英语世界传播度较广的詹姆斯·理雅各与亚瑟·威利的两个译本来比较安郝译本中承载道家思想的术语翻译特点。为精简表述,本文将安乐哲郝大维的译本简称为安郝,将詹姆斯·理雅各的译本简称为理雅各,将亚瑟·威利的译本简称为威利。

例1 原文: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第三十八章)^①

安郝^{[8]174}: Persons of the highest efficacy neither do things coercively nor would they have any motivation for doing so.

理雅各^{[15]80}: (Those who) possess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those attributes did nothing (with a purpose), and had no need to do anything.

威利^{[16]230}: The man of highest ‘power’ neither acts nor is there any who so regardshim…

例1中,对于“无为”的阐释,安乐哲与郝大维译为“neither do things coercively”,意为无强制性的行为。理雅各译为“did nothing (with a purpose)”,表示(带有目的地)无所作为,传达出“无为”的字面意思。威利译为“neither acts”并在注解中解释,“无为”指不以特殊的方式运用权力,与“上德”的“highest ‘power’”相呼应,是根据上下文语境阐释“无为”。安乐哲与郝大维立足于道家哲学中,将“无为”放在“道德”之中,“道”是连续不断的经验之流,“德”是持续发展的个别经验现象^{[8]42}。道家修道所力图克服的纷乱源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事物又构成自我实现的环境^{[17]53}。“无为”正是这种遵从万物之“德”的无强制性行为,即个体自发地顺应已经认识到的事物的“德”,与事物建立起无冲突的和谐关系,从而在事物的整体环境中实现自我。安乐哲与郝大

维的“neither do things coercively”正是在“德”之焦点与“道”之场域中将“无为”的自发性呈现了出来。

例2 原文:夫为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第七十章)

安郝^{[8]253}: It is only because it requires unprincipled knowing(wuzhi) t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me.

理雅各^{[15]112}: It i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these, that men do not know me.

威利^{[16]230}: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men do not understand this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me.

例2中,安乐哲和郝大维将“无知”译为“unprincipled knowing”,传达出无原理性的认知之意。理雅各译为“do not know these”,根据理雅各译文的前文,“There is an originating and all-comprehending (principle) in my words, and an authoritative law for the things (which I enforce)”,可知“these”指的是“principle and law”(道),理雅各在注解中解释,这一章的主题是自我主张难以被他人正确理解,“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在抱怨“道”不为人知。本文认为,理雅各是通过《道德经》的历史背景来理解第七十章的内容,老子所处的时代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其推广的主张又不为人理解,故老子无奈之下写了这一章。威利译为“do not understand this”,其上文为“But my words have an ancestry, my deeds have a lord”。威利在注解中解释道,没有祖先也没有领主是一种隐喻说法,表示圣人的所言所行都与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相关联,由此可知,“do not understand this”即世人不明白老子的思想系统。故本文推测,威利也是根据老子的时代背景来理解“无知”。安乐哲与郝大维将“无知”阐释为无原理性的认知,也即不以原理为基础的认知,原理决定了一个现象的存在、意义和活动^{[17]54}。无原理性的认识是从人对于事物“德”的认识,或言人的焦点意识推理而来,即根据建构世界的始终存在的特殊性来认识事物^{[8]42},而不是根据事物与某一概念或普遍原则的关系知识来认识事物。安乐哲与郝大维将“无知”置于道家哲学情境中,把“无知”与点域论结合起来,推导出无知在英语中应译为“unprincipled knowing”,即无原理性的认知。

① 各译者参考的《道德经》版本不同,本文以安乐哲与郝大维参照的《道德经》版本为原文。

通过对比安郝、理雅各与威利的译本可知,安乐哲与郝大维摒弃了从字面意思、从上下文或从时代背景解读术语思想的传统方法,转而在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蕴含道家思想的术语,其中“无”形式就是典型的例子。正是在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道家哲学术语方法,让安乐哲与郝大维跳出了局限的历史视域,与《道德经》文本视域融合,从而产生了全新的阐释。在安乐哲与郝大维的诠释中,道家哲学不再是消极避世的思想,而是教人在积极入世中如何将经验最优化,如何在环境中实现自我的哲学。

(四)使用过程性语言体现过程哲学

安乐哲深受唐君毅的中国古典自然宇宙哲学观和葛兰言的“关联性思维”等大家观点的影响。唐君毅1937年曾对中国哲学宇宙观的特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包括“万物以时间为本质观”。唐君毅提出,在中国哲人的时间观里,时间之流形成的波涛就是天地万物,或言“天地万物变化流行下面的一股灌注之力就是时间”^[18]。安乐哲在《〈易大传〉与中国自然宇宙观》一文中探讨的中国宇宙观也借助唐君毅的观点来检验,“…借助他的洞察力与权威,来检验我对于中国宇宙观的扼要说明是否恰当。”^{[10]174}唐君毅的“万物以时间为本质观”影响了安乐哲将中国哲学视为过程哲学的观念。安乐哲进而接受了葛兰言“关联性思维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的观点。关联性思维重视变化或过程,以关联过程来说明事物的状态^{[12]7}。译者将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宇宙观、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葛兰言的关联性思维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哲学属于过程哲学、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为关联性思维的哲学研究性情。性情又融入译者比较哲学家身份的塑造过程中,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

安乐哲与郝大维认为,“《道德经》里的‘万物’是生动的‘过程’和进行的‘现象’,由此那些有可能将这个世界‘客体化’的名词就会生出或转化出动词感。”^{[8]66}因而《道德经》安郝译本的语言呈现出过程性特点——两位译者在文本翻译过程中通过将部分名词转变为动名词或动词来体现过程感与变化感。本文结合詹姆斯·理雅各与亚瑟·威利的两个译本来比较安郝译本的语言特点。

例3 原文: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第一章)

安郝^{[8]87}: Way-making (dao) that can be put into words is not really way-making. And naming (ming) that can assign fixed reference

to things is not really naming.

理雅各^{[15]47}: 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T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name.

威利^{[16]141}: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

例3中,对于“道”和“名”,三个版本译法各不相同。安乐哲和郝大维把“道”译为“way-making”,表示构筑中的道,“道”并未被铺好,并不是单一指向的,“道”可能在构筑过程中变化,体现了“道”的过程性。把“名”译为“naming”,表示命名的过程,因为事物并非恒定不变的,命名并没有固定的所指,所以命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理雅各用威妥玛拼音来译“道”,“道”作为专业术语,使用音译法看似并无不妥。但在“非常道”的翻译中,理雅各用“enduring and unchanging”来修饰“Tao”,显示出“道”的永恒性和单一性。威利将“道”译为首字母大写的“the Way”,难免令西方读者联想到上帝之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①。对于“名”的翻译,理雅各与威利分别用了“name”与“names”,将“非常名”译为“unvarying name/names”,体现出命名的静态性、恒定性,表明译者没有考虑到事物的流动变化性。

例4 原文:有无之相生也…先后之相随,恒也。(第二章)

安郝^{[8]91}: Determinacy(you) and indeterminacy (wu) give rise to each other… And before and after lend sequence to each other—— This is really how it works.

理雅各^{[15]48}: So it is that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give birth the one to (the idea of) the other… and that being before and behind give the idea of one following another.

威利^{[16]142}: For truly Being and Not-being grow out of one another… Front and back give sequence to one another.

《道德经》第二章主要讲老子万物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的思想。例4中对于“有”和“无”翻译,安乐哲郝大维译为“determinacy and indeterminacy”,理雅各译为“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威利译为

① 《约翰福音》14:6。

“truly Being and Not-being”。在注解中,安郝译本提出,“有”“无”解释了事物彼此何以会相互依存。韦氏词典显示,determinacy 是指具有决定性的性质或状态,indeterminacy 指不具有决定性的性质或状态。“determinacy”与“indeterminacy”二者互相对立,也正是对立关系为事物朝着对立面转化提供了条件。万物并非处于绝对的二元对立中,而是在二元中衍生出第三维,彼此依存。理雅各译法的侧重点在于事物存在与否,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对立关系。威利“being”的译法折射出西方本体论的影子,令西方读者联想到永恒的“存在”。对于“先后”的翻译,安乐哲郝大维译为“before and after”,理雅各译为“that being before and behind”,威利译为“Front and back”。安乐哲郝大维的译法侧重于事物在时间先后上的互相转换,映射出中国古典自然哲学观的对于万事万物在时间中变化的特质;而理雅各与威利的译法更偏重于空间的前后,且理雅各是指在空间前后上,存在(being)产生了随后的事物,“being”的使用也难免落入西方本体论的窠臼。由此可见,安乐哲与郝大维是通过中国古典自然哲学观的特质来译解《道德经》——事物相互关联、彼此依存,时间穿透其中,万物在时间的流变中变化。

诚然,除唐君毅与葛兰言的影响外,安乐哲还受到了怀特海、杜威等大家的影响,本文在此仅论述唐君毅与葛兰言对安乐哲比较哲学家身份的塑造作用。在语言特点上,汉语词汇不像英语能够通过词形曲折变化来体现静态或动态义,汉语的动态过程义隐含在词汇的深层语义中,故只能根据语言语境来体现。受比较哲学家身份的影响,译者还原了源文本语言的过程性,即译者跳出了宗教和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局限,通过有目的地选择译入语词汇,突出了语言的过程性特点,重现了《道德经》属于过程哲学文本的性质。

三、结 语

本文针对安乐哲与郝大维翻译的《道德经》版本,结合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探讨了译者的比较哲学家身份对《道德经》翻译实践的影响,认为译者的职业身份既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观又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作为比较哲学家,译者突破了前人“以西释中”的单一方法,通过“以中释中”和对比中西哲学异同等方法,在《道德经》翻译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方式,让西方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道家思想。对翻译实践的研究

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层面,也需要关注译者为何如此呈现译文的原因,其中掺杂着权力因素、文化因素、读者期待因素与译者个人偏好等因素。仅译者个人而言,当译者具有多重职业身份时,除翻译者身份外的其他职业身份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如安乐哲与郝大维的翻译策略选择主要是受其比较哲学家的身份影响,因此对译者研究而言,译者身份也需纳入到考量中去。

参考文献:

- [1] 辛红娟,高圣兵. 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1): 79-84.
- [2] 路斯琪,高方. 儒莲法译《道德经》的经典生成路径及呈现[J]. 中国翻译, 2020, 41(1): 54-61.
- [3] 夏歆东.《道德经》译者理雅各的理解前结构探析[J]. 外国语文, 2014, 30(2): 152-157.
- [4] 吴冰,朱健平. 阿瑟·韦利英译《道德经》中的历史文化语境重构[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9(2): 91-97.
- [5] 张小曼,胡作友. 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英译[J]. 学术界, 2015(2): 135-141.
- [6] 张骋.《道德经》中“道”的概念在西方的误读与误导:以韦力和安乐哲的译本为例进行分析[J]. 黑龙江史志, 2013(17): 160-161.
- [7] 屠国元,朱献琰.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2003, 24(6): 8-14.
- [8] 安乐哲,郝大维. 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 何金俐,译.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4.
- [9] 安乐哲,安乐哲比较哲学著作选[M]. 温海明,译. 贵阳:孔学堂书局, 2018.
- [10] 常青,安乐哲. 安乐哲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观:从《道德经》的翻译谈起[J]. 中国翻译, 2016, 37(4): 87-92.
- [11] 安乐哲,郝大维. 孔子哲学思微[M]. 蒋弋为,李志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郝大维,安乐哲. 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M]. 施忠连,何锡蓉,马迅,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
- [13] 刘殿爵. 翻译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一些困难[C]// 探掇英华编辑委员会. 探掇英华刘殿爵教授论著中译集.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4: 293-298.
- [14] Lau D C. Lao Tzu Tao TeChing[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3: xiv-xxiv.
- [15] Legge J. The Texts of Taoism[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62.
- [16] Waley A. The Way and Its Power The Tao Te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88.
- [17] 郝大维,安乐哲. 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 施忠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53-54.
- [18] 唐君毅. 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M]. 台北:学生书局, 1988: 104-107.

(责任编辑:陈丽琼)